

# 张国庆 | 小麦秘贸：加拿大人苏约翰在中国荒年的救贖

原创 张国庆2 盐马帮 2024-05-23 09:07 四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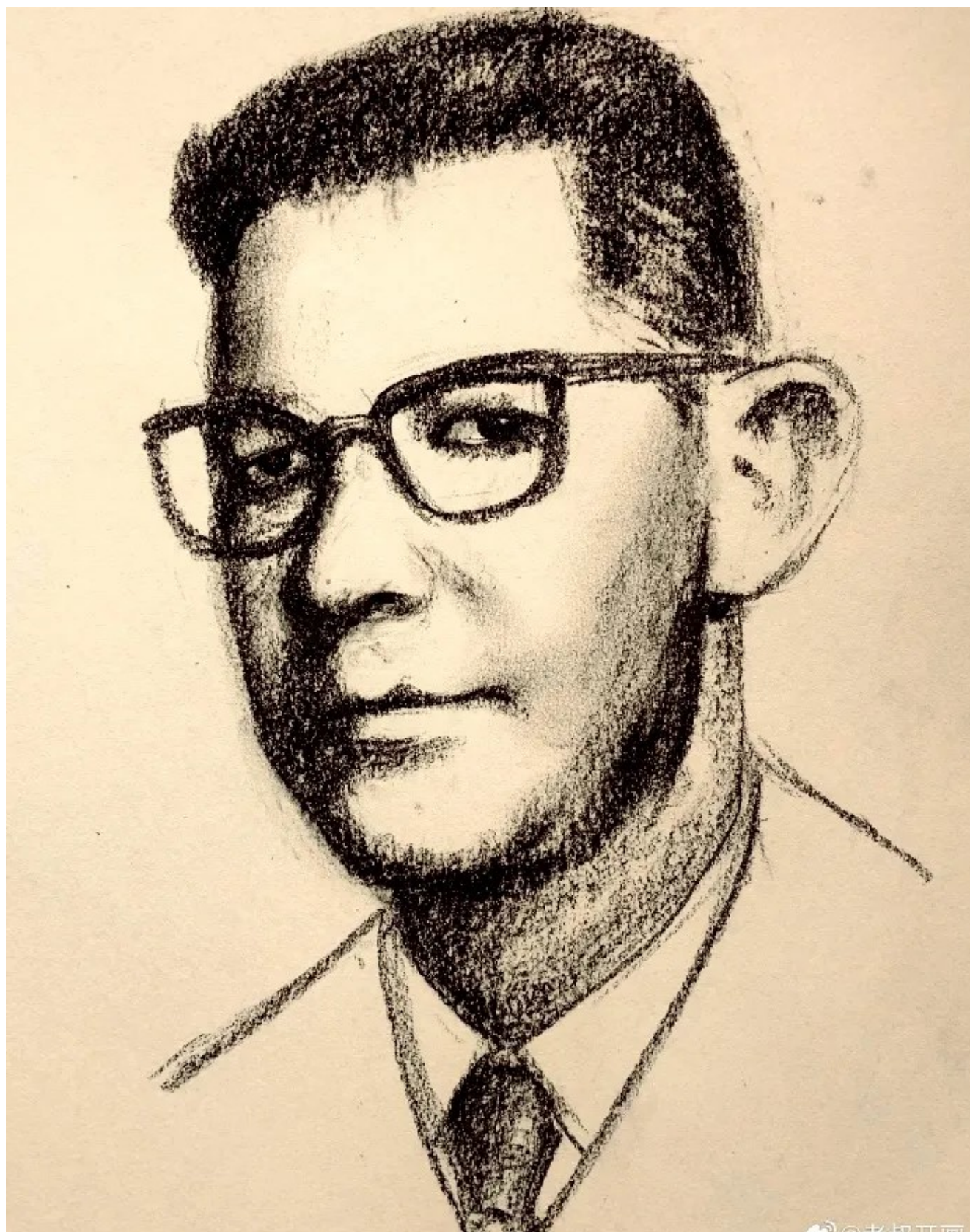


点击上方蓝字，即可免费关注

惟愿公平似大水滾滾



使公义如江河滔滔



**图片取自老叔开画**

以加拿大宣教士早年来成都“兴学办医、倡导文明”为主题，一场关乎“历史·大爱·瞬间——大洋彼岸的中国情缘”的人文展览，在刘文彩老家大邑县的新场镇一展就是7年，7年只展出一个主题，恐怕这在成都历史上从来没有

过。

笔者穿行在主题丰富，史料详实的各大展区，寻找一位叫苏约翰的加拿大人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正是由他的推动的中加小麦秘密贸易，使中国许多城市人口，免于了饥饿。





这之前，我刚刚从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和《中国党史研究》等官方刊物上，看过几篇既沧桑又暖心的回忆文章，讲述上世纪60年代三年灾荒时，中国与加拿大进行小麦秘密贸易的故事。几千万吨小麦从大洋彼岸运抵中国后，迅即又悄无声息地流入到中国城市居民的餐桌上，从而使城市人口避免了类似于偏远农

村那样的饥荒。



苏约翰就是那场划时代粮食贸易的主要推手和台前幕后的执行人，作为特殊时代最早打破历史坚冰的西方使者，苏约翰秉承了父辈们那种爱与怜悯的救赎情怀，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时刻，搭救了多城多地中国人的生命。

不出所料，在新场镇史料浩繁的展区内，我看到了配有苏约翰黑白照片的简介，与苏约翰四目相对的那一瞬，我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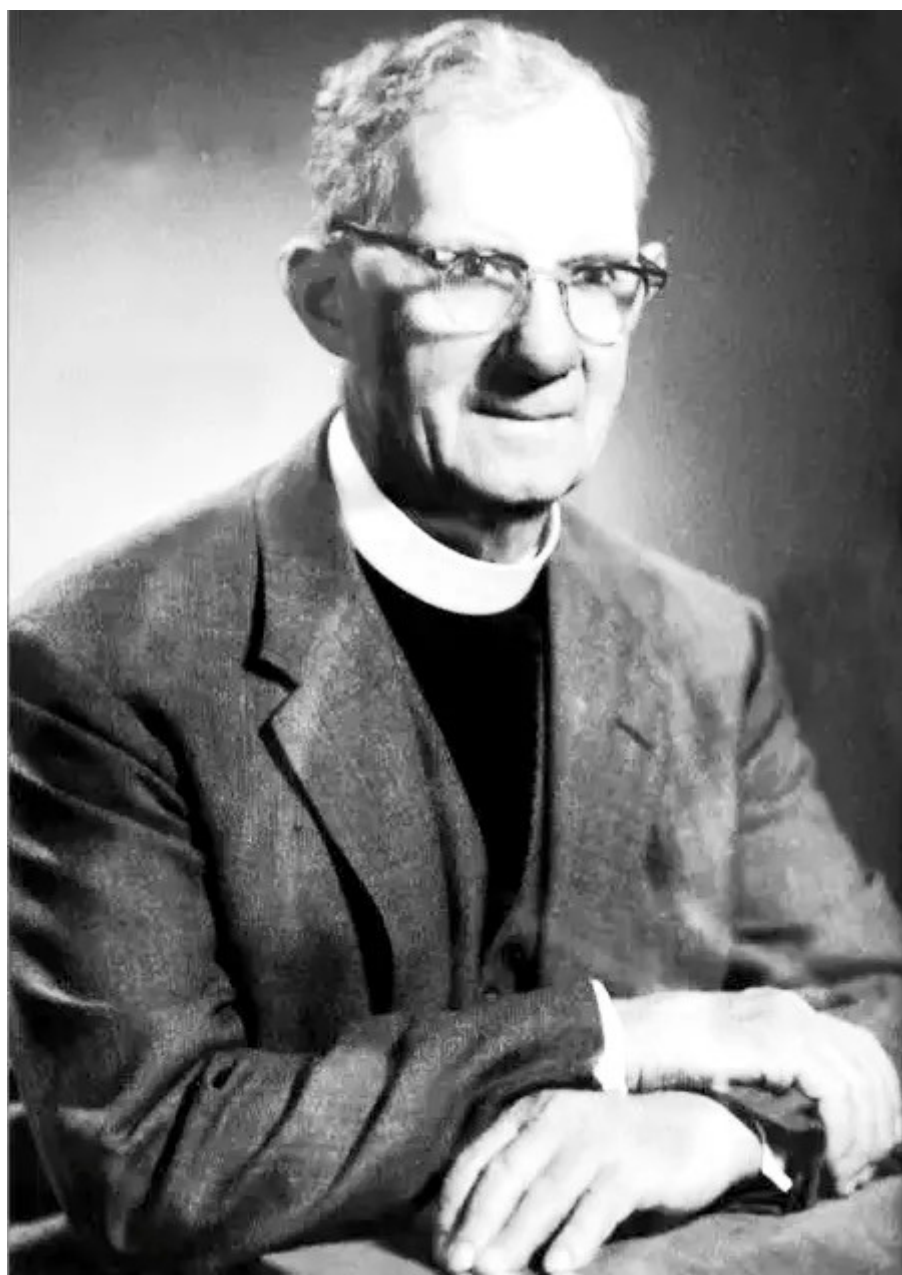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介是这样写的：John 1919年12月出生在成都，幼年时就读于CS学校，1949年回到加拿大多伦多。从1958年起一直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，被加拿大政府派驻香港，负责与中国的小麦贸易。1972年，接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工作，为中

加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看似平淡无奇的简介，在我这个慕名而来的参观者面前，却传递出许多瑰奇而非凡的信息。

苏约翰出生在民国初年的成都，这是他一生与中国相通的印记。那时虽说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但蒸汽轮船的出现，却把滚滚长江演绎成为西方宣教士眼中的“福音大道”。苏约翰的父亲苏继贤就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，作为新文明的开拓者，沿长江溯流而上，抵达成都的。



苏约翰的父亲苏继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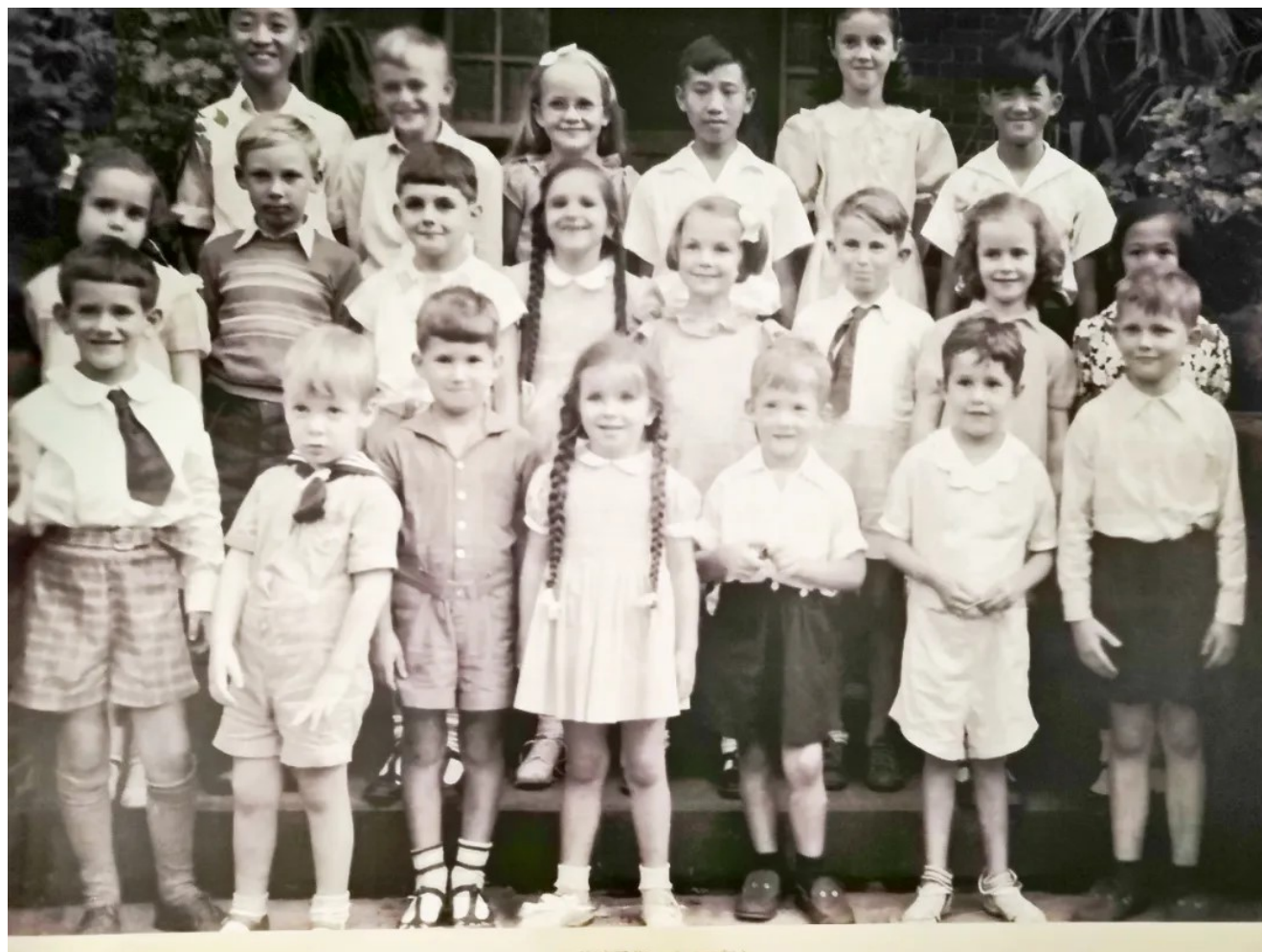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成都人，恐怕早已忘记苏约翰父亲的洋名，但只要提及一位叫苏继贤的“洋木匠”，仍是如雷贯耳。古人云“夫贤者，百福之宗也”，大名鼎鼎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园（原华西医科大学），就是由苏继贤亲自设计打造的杰作。如今华西坝上这些雕梁画栋、古朴典雅，中国宫殿似的大厦与西式花园洋楼交相辉映的建筑，仍有许多为教学所用，并已成为中西合璧的最经典的建筑群落。





从清末到民国，许多拿加大宣教士被母会差派到成都，他们献身于中国福音事工的同时，兴办医学，倡导文明，救死扶伤，有的家庭甚至三、四代人服务于中国社会。但是，这些宣教士的孩子，因着语言障碍和民族文化习俗等问题，读书学习就成为洋家长们头疼的大事。

于是一座名为**Canadian School**的学校在众筹中建立起来，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很齐备的全日制学校，凡在这所学校读过书的加拿大孩子，都有一个特别称谓：“**CS孩子**”。



苏约翰就是**CS**学校的**CS孩子**。

苏约翰们这一代“洋娃娃”，就像谭楷在《枫落华西坝》一书所记载的那样：他们一出生，就处在“中国语境”中，他们第一语言自然是中文，英语反而成了外语；他们也是在中国箩筐、背篓、竹制的椅轿轿和木制的摇摇车里渐渐长大的，他们也与中国娃娃们一起做游戏、玩泥巴、躲瞎猫、斗公鸡……

当然，入乡随俗，CS孩子们必修中国书法、学习中国历史、诵读中国诗词歌赋、甚至连珠算也被纳入日常教学之中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些洋孩子从小就有“中国胃”，对麻婆豆腐、回锅肉、鱼香肉丝和锅巴肉片等传统川菜情有独钟，以至许多年后他们回到加拿大，在每年例行的聚餐会上，都要请中国厨师特制这些菜肴，正式就餐时还会用四川话一起吆喝：现在吃饭啰。



这些中国元素，成为CS孩子们一生至臻的情感记忆。作为一个跨地域、跨文化的精英阶层，CS孩子们返回自己母国后，凭借通晓东西方文化的优势，在冷战和国际化的双重背景下，他们此后大都成为加拿大各领域炙手可热的能人。

苏继贤的儿子苏约翰就是他们中的翘楚。

经过几十年人世沧桑、岁月洗礼，加拿大现在仍健在的CS孩子还有33人，他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，无一例外都是中加友谊的薪火传人。



上世纪50年代，在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”的狂热口号中，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、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。三面红旗下的农村莺歌燕舞，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的同时，几千万青壮年农村劳力又被调拨到城里成为“炼钢工人”。随着极左之风越刮越猛，国家政经失策、农工倒铨，胡干蛮干成风。



大干快上却又欲速不达的后果，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席卷南北的人道灾难——持续三年之久的饥荒。

那时年方38岁苏约翰，已被加拿大政府委派到荷兰海牙担任农业贸易官，而CS孩子们也都到了风华正茂的年龄，成为加拿大文化、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行家里手。虽说那时东西方冷战正酣，但CS孩子们依然关心中国时事并努力保持与中国的有限联系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当中国遭遇饥荒的消息零星传来后，CS孩子们感同身受，异常震惊，迅速利用各自的平台和资源，追寻、关注事件的进展，并将一份共同拟定的中国灾情研判报告，火速传给身为农业官员的苏约翰，提请他为自己同胞施以援手——因为CS孩子的出生地都是中国，他们历来都将中国人视为同根同源的同胞，而非外族人。



事实上，加拿大政府有情报共享机制，苏约翰早就通过香港的渠道，了解到了中国出现的困难。但如何突破冷战的壁障，与中国进行感情与市场的融通，只有政府决策和授权后，他们才可以试着推进……但苏约翰并没有坐以待令，他在CS孩子报告的基础上，重新起草了一份机要文书，以密码方式呈报给加拿大农业主管部门。苏约翰认为：倘能以农业贸易为契机疏通与中国的关系，不但能改变中加之间呆板冷漠外交局面，还能为加拿大农产品找到一个人口众多且长期固定的大买主。

整个50年代，加拿大风调雨顺，农业收成极好，加上农业机械化大规模运用，耕地面积得以不断扩大。粮食激增后却因市场销售渠道固化，市场竞争激烈，价格波动大，农民实际收益并没增加多少。政府为了缓解粮食过盛危机，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财税补贴，将富余部分粮食收购入库，以期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大宗买主接盘。



而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人口体量，可以轻松消化加拿大的粮食库存。



加拿大保守党领袖迪芬贝克从农业问题中，看到了政治希望。在1957年12月举行的选战中，迪芬贝克高调许诺，他领导的政党将为加拿大农民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，为农民创造更为富足的生活条件……在农民力挺之下，保守党果然赢了年度选举，重新执政。

不久，苏约翰的好友阿尔文·汉密尔顿在组阁中被任命为农业部长，他把苏约翰召回述职，并就如何打开中加粮食贸易壁垒彻夜长谈。汉密尔顿甚至说：我们一起来拯救两个国家吧。



时任农业部长的汉密尔顿

1958年春，在加拿大农业部的推动下，迪芬贝克政府迅即启动了两项对华特别行动：一是加拿大著名的《环球邮报》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，作为西方最早进入

中国的国际媒体，《环球邮报》总编还因此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亲切接见；二是苏约翰重新领受“国家使命”，被农业部长汉密尔顿从欧洲的海牙调往他心驰神往的东方，成为加拿大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，他的任务就是拓展新兴农业市场，尽快打通中加小麦贸易渠道。

显然，《环球邮报》落户北京决不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文化事件，随着大陆方面的信息得以透过《环球邮报》的载体，直接流向香港，苏约翰判定中国对粮食的需求正与日俱增。



事实上，比苏约翰和汉密尔顿更着急的是迪芬贝克总理，他几乎是被加拿大农民力挺上位的，他必须尽快开辟一个持续稳定的新兴市场，来缓解国内粮食过剩的危机，并兑现其选战诺言。

而东西方冷战，荒年中国也急需突破自我禁锢，抛开面子，撕开铁幕，在风雨飘摇的苏联阵营外，找到庞大而稳固的粮源供应，以缓解国内持续不断的灾情。

可以说，中加两国都是刚需。

作为加拿大少有的中国通，苏约翰也清楚万事开头难，中加两国军队曾在朝鲜铁原的种子山一线，有过殊死搏斗，双方都杀红了眼，如今要捐弃前嫌，探索合作与发展，仍不是朝夕可行的事。



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，受国内外环境诱因的影响，中国灾荒越显严重，国内粮食供应时常断链，形势十分严峻。据《中国党史研究》披露：由于各地灾情日盛，工作在中央一线的几位领导心急如焚，经过集体反思与磋商，由陈云和李先念呈请开放国门，向西方紧急购买12亿斤救济粮，以缓解国内粮荒之危局。

陈云和李先念破天荒的申请报告，其实也是周恩来总理自己的意思，他特事特办，在签批“同意”时，还特意写下了“急办”的意见。当这份报告最终转到毛泽东的案头时，毛思绪万千，夜不能寐，来回踱步良久，大笔一挥，就将12亿斤改为20亿斤。

有了上方宝剑，国务院赓即敦促对外经贸部见机行事，抛开政治歧见，尽快与国际农业市场对接……但过程仍很游离，鉴于当时特定的国际气候，首先走上前台的却是香港红顶企业——华润公司（今日华润集团），他们开始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试探性接触，准备见机下单。



这的确是中国最艰难时期，因着饥荒连连，苏约翰几乎天天都能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内地灾民逃港的消息，为了验证消息的可靠性，苏约翰自己也多次跑到粤港边界巡察，亲眼目睹了密密麻麻逃难人群被阻隔在罗浮桥外的凄惨处境。苏约翰错愕不已，他几乎每天都会与汉密尔顿通电话，敦请政府拿出更加灵活的手段和对策来应对中国时局，帮助中国度过危机，就是成就加拿大农业的新生。

苏约翰被授予更大的自主权，而活络的政策很快就迎来了敲门砖效应。

华润公司透过香港商会就向加拿大方面发出几轮协商邀请后，中国对外经贸部开始接手秘密磋商，由下至上，地点在北京和香港两地进行。因着这是救命粮，中加有关方面心有灵犀，打破了惯例，大行方便，大开绿灯。

有说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，中加粮食秘贸也走过这条路——1960年10月，经苏约翰牵线搭桥，加拿大CS孩子们多方奔走联络，一个受到加拿大民间团体特别支助的中国京剧团，像酝酿已久的和平使团，突然访问了枫叶之国的加拿大，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，神奇地呈现在加拿大媒体的聚光灯下……



打铁趁热，仅仅月余，还处在军绿和灰白服装一统江湖的大陆，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国外贸官员，却在苏约翰“灵巧如蛇”地护送下，怀揣着6000万美元的转账支票，稳重踏实地跨过罗浮桥，从香港机场秘密登机，跨越浩瀚的太平洋飞抵加拿大，中加小麦贸易正式登场。

得益于迪芬贝克总理的支持和农业部长汉密尔顿的巧妙安排，加拿大方面以对待邦交国的礼数，热情接待了中方，给足了中方足够的面子。短短十几天，第一笔小麦贸易就轻松敲定下来，加方以比市场价格还低的优惠，向中方出售了76.2万吨小麦和32.7万吨大麦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也是中国重返西方市场的一次成功尝试。

苏约翰大得安慰，他说他父亲那一代人，秉持信仰使命，试图救赎人的灵魂；而他们（CS孩子）这一代，虽然已经远离中国，但树大根深的情感犹在，仍可为自己的出生国服务，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帮助。



需要说明的是，作为西方阵营的铁杆盟国，因着朝鲜战争，加拿大与相关盟邦共同签署有“中国特别禁运表”等法律文书，粮食贸易被视为“可禁止”之列。而美国国会也制定了《美国与敌对国家贸易法》，对参与中国“非正常”贸易的国家，进行政治干预和经济制裁。因此，加拿大与中国的小麦贸易只能秘密进行。

但几轮贸易下来，交易数额越来越大，运粮船队也越来越多，美国察觉到了这一苗头，开始动用法律条文，以政府名义横加干涉。加拿大也不示弱，引用联合国宪章，表明人道主义也是普世法则，中加小麦贸易决不能停止。

迪芬贝克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良好私人关系，也就此终结。



图为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

据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显示：1960年10月-1963年春，中国从加拿大共进口了4800万吨小麦和100多万吨大麦，加之从全球其它市场拓展的购粮渠道，至少解决了中国13%的城市人口近2年的口粮。得益于此，中国城市人口死亡

率从1960年时的14%，减少到1961时的11%，至1962年年底，死亡率逐渐恢复到小于8%的正常水平。

值得大书特书的是，城市购粮渠道的拓展，形成了供应链的良性循环，政府每年从农民手里征购的粮食，因有海外市场的补充，亦相应从占消费总量的30%锐减至16%~17%，差不多减负近半。农村得以休养生息，村民非正常死亡现象也得到初步遏制。

当然，教会总是每个时代最先寻求宽恕与和解的典范，苏约翰的哥哥也是同为CS孩子的苏维廉，在错综复杂的对华关系中，与苏约翰亦步亦趋，遥相呼应。正是在他的倡导下，CS孩子们奔走于加拿大各地，组织创办了加拿大第一个中加友好协会，并最终促成中加两国关系正常化。



1970年后，在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推动下，世界格局因“化敌为友”而发生嬗变，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后，美国总统尼克松高调中国行。加拿大闻风而动，不失时机地调整国家战略，并为此打出了一张国家王牌：特命苏约翰为驻华全权大使，全面开启中加合作的新时代。

中方心领神会，互动配合。1972年10月22日，也即是苏约翰走马上任之

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特别发布了“加拿大驻华大使到京”的新闻。朱德元帅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苏约翰——这种比照东方阵营接见西方外交官的礼仪，在冷战时的中国外交场合十分罕见。

其后，由苏约翰陪同，周恩来总理还亲切照会了已经卸任的汉密尔顿先生，情到深处，周恩来对加拿大的朋友们说“三年的灾荒几乎粉碎了我们的‘热情’，我们没有朋友，而你们却卖给我们小麦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。”

1976年10月8日，苏约翰不辱使命，圆满结束四年任期后载誉回国。就在此前两天，于无声处响惊雷，古老的紫金城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——四人帮被抓捕了。苏约翰在随后的述职报告特别提请加拿大政府：做好准备，中国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。

2006年，悲天悯人的苏约翰安祥辞世，享年87岁。

光明问候 29

光明问候·目录

上一篇·张国庆 | 地铁小哥认知障碍落入信仰自招的窠臼